

费孝通江村研究50年

刘 豪 兴

建立社会调查基地

中国社会学恢复工作刚刚起步，费孝通教授就把建立社会调查基地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把建立社会调查基地作为学科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他认为社会调查基地是观察社会的窗口，培养专业人才的课堂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1981年5月，他在答《中国青年报》读者问中谈到“我们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来讲社会学，而联系中国实际，只有搞社会调查。我们的社会学也得象自然科学一样有个实验室，就是有个地方可以有系统地接触社会生活，这就是我们正在想建立的‘社会调查基地’。”^①

在中国建立社会调查基地，当然不是现在的发明。在20年代中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不久，便在北京市郊建立了清河社会实验区，社会学系的师生经常到那里进行社会调查，开展社会服务工作。1930年出版了《清河镇社会调查》（英文版），其后还有《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1931）、《清河社会试验》（1933）等著作发表。稍后，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和拥护者纷纷在全国各地建立各种试验区，其中最有影响又发表有多种专著的是晏阳初在河北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区”。社会学教授李景汉等受聘在定县进行了多年的实地调查。这个试验区研究的结果，先后发表了《定县的实验》（1931）、《定县实验区考察记》（1933）、《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定县保健制度之实验》（1933）、《定县社会改造事业中之保健制度》（1934）、《定县农村工作调查》（1936）等。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旧中国的种种试验研究成果，在总体上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研究者们确实实在做实事，他们的研究给后人留下了比较真实的社会资料，他们为社会调查基地的建设和社会学的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费孝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建立社会调查基地，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历史经验的借鉴。选择什么地方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基地呢？他选择了江村。江村是使他成名，又曾使他遭受不幸的一个村庄，他比较熟悉；江村是数十万中国自然村中的一个村庄，接近沪、苏、杭等大中城市，有其特殊性，半个世纪以来，江村差不多经历了中国社会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有其普遍性；40多年来，这个农村已有过几次社会调查，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比较资料：《江村经济》（1939）、《重访江村》（1957）、《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1963）；当地党、政领导支持、群众信任。所有这些都是建立社会调查基地的有利条件。

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明确提出了建立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的计划，江苏省委、苏州地委和吴江县委对此表示大力支持。是年12月16日，在费孝通的指导下，一支由京、

^①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4页。

津、沪、宁11个单位组成的调查组来到江村，进行探索性的社会调查。同时，宣告了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的建立。此后，年年有专业人员或大专院校师生来江村进行专题调查或随访。各种调查积累了不少新的资料，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费孝通在酝酿建立江村社会调查基地时说：“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使社会科学的知识能同广大农民的具体生活密切结合，一方面使我们的科学知识能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逐步建立起新中国的社会学这门学科。”^① 8年来，江村社会调查基地已在社会学学科发展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这些作用主要是：（1）它使社会学工作者有了比较固定的观察中国农村社会历史进程的窗口，较好地保持了一个农村社区调查的连续性、可比性、科学性；（2）它使新一代社会学工作者从实践中得到社会学的基本训练，从中增长才干，使老一代社会学家从实践中汲取了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的养料，江村成了一所传帮带的实验学校；（3）它有利于社会学工作者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4）它所发生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被研究者反映出来，已为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改进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促进了江村和其它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5）它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国外的专家、学者来访，为国际友人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实例；（6）与此同时，扩大了江村这个普通农村在国际上的影响；（7）它为1985年开始的江村50年的全面调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追踪农村变革的实践开展社会学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不唯书、不唯上，他始终跟随着农村变革的实践进行观察。

1936年夏天，费孝通初访江村。30年代的中国农村，正在受帝国主义的打击，经济衰退，农民在想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救。以他姐姐费达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将科学技术下乡，教农民科学养蚕制丝，扶持农民办合作丝厂，促进了生产发展，深受农民的欢迎。吃饭靠种田，用钱靠副业，江村农民的副业收入超过农业。费孝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见到人就问长问短，细心观察，把看到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积累了翔实的资料。不久，他到英国留学，用这个村的调查资料，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主张。这本书在人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过去的人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落后地区的民族。而且是白种人去观察非白种人，殖民者去研究殖民地人民。其目的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而是为殖民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费孝通作为中国人，研究文明发达的中国农村，在方法上为人类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他在书中的最后一章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② 为此，“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③ 但如何解决中国当时的土地问题，他并不明确。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

解放后，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了，农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江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0年代中期，江村建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化促进了生产吗？农民生活改善了吗？农村

①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41页。

② 《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00页。

③ 同上，第202页。

前进道路上有什么障碍和应该怎样消除这些障碍？这些问题坐在京城里是难以作答的。1957年5月，费孝通带领调查组回到他熟悉的江村，希望从中找到答案。他在村里住了20天。社干部和群众信任他，无话不说，他听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找到了江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症结所在。与21年前相比，江村的农业增产了60%，但许多人手头紧，日常缺钱用，甚至不少人感觉到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合作化后，农业单一生产，许多副业不能搞，收入最多的蚕桑生产也遭到了破坏。农民的收入锐减。他通过比较分析，断言农民生活水平提得不高，“问题出在副业上”。^①“我看，要显著地提高这类地区的农民收入，单纯的从农业入手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②他提出，在这一类农村，“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③“我希望在农业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是否可以放开来争鸣一下，多从实际研究研究，农业和工业之间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们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④回到北京后，应《新观察》杂志编辑部之约他据实写了《重访江村》，连续发表了二篇。他主张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副业。但当时“以粮为纲”的风已开始刮了，他的观点与此相悖，罪莫大矣。没有等第三篇文章发表，他就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定为右派分子了。自此，他的学术研究权利被剥夺了，更想象不到何日还能再访江村。

经过“文革十年”动荡，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社会科学繁荣的春天回来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取得了应有的地位。费孝通这位老社会学家，当年把《江村经济》一书作为他献身中国的一个起点，几经坎坷才获得了重新研究社会学的权利，又自然而然地萌发了一个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回到江村这个地区，把那里的情况好好研究一下。认识是无止境的，“要认识实际必须经过实践的多次反复。”^⑤“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继续调查，有可能从这个窗口看出中国农村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变化。”^⑥

费孝通对江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忘江村，江村人也时刻惦念着他。他经常说，“我们和农民心连心”。这是实地调查中的重要条件。他三访江村时，人们奔走相告，围坐着他拉家常，提问题。他重访江村时，人们谈论的是粮食和钱的问题。如今，人们把眼光盯在工业、副业上。农民做的和他几十年来所想的交融在一起了。他敏锐地抓住这个题目，向干部和群众请教。1961年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以后，农民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农村经济有所发展。江村的粮食和蚕茧单产比5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土地面积不能增加，单靠提高单位产量，就江村地区来说可供挖掘的潜力已经有限。要使江村的经济继续繁荣起来，只有向多种经营和工业的方向发展。在短短几天的调查中，他看到，“现在江村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存在着新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进一步富裕起来，如何工业化，如何缩小城乡差别等问题。”^⑦江村人沿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向前迈步，在1981年秋天，连绵阴雨使粮食产量降低二成的情况下，人均收入达到了300元的新记录，比1978年的100余元增加了近

① 《重访江村》，《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24页。

② 同上，第223页。

③ 同上，第227页。

④ 同上，第228页。

⑤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63页。

⑥ 同上，第164页。

⑦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38页。

2倍。“为什么农业收成不算好，而农民收入依然不断上升呢？”费孝通在1982年春节前夕“四访江村”后说：“原因是这个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在这三年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①1978年前，江村农、副、工三业的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50%、23%、27%，1981年分别为30%、15%、55%，工业收入超过了农业和副业收入的和。这是一个喜报。他赶回北京，参加首都春节团拜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报告了家乡的这个喜报。他说，“目前江南一带农村里有各种各样的社队工业，有如雨后春笋，遍地生长。”“现在需要的是加以支持和领导，让它更加快地顺利成长，做到满园春色、百花齐放。”^②他的讲话在首都舆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有人赞成、支持，有人批评、反对。这原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有人却把问题上纲上线，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等等。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使决策机关作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才于半年之后予以肯定。但有的地方顶不住舆论的压力，将相当一部分社队工业砍掉了。费孝通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社队工业（后改称乡镇企业）。他认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10亿人民8亿是农民。中国不能走西方早期工业化的道路，不能把大批农民集中到大中城市去。中国的出路是要使广大农民在原地变成工人，也就是“工业下乡”，把工业扩散到农村，把工厂办到农民身边或小城镇上。“这样既可以为农村劳动力开拓就业机会，又可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我认为发展乡村工业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目前已成为农民的迫切要求。”^③

农村发展工业和副业，由单一性的自给自足经济进入一个商品化的经济。这是农村社会经济繁荣的正确道路。然而，农村商品出来后到哪里销售，这里有一个纽带，就是小城镇这个流通渠道。农民手里有了钱，要购买物品，也要通过小城镇。费孝通在进一步探讨农村现代化道路时看到，农村与小城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农村好比一个很大的细胞，小城镇犹如中间的核心。一个是面，一个是点，这个点把各个村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活动的社区。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曾经谈到村庄和城镇的联系，但当时没有条件深入调查和研究。1982年，他更上一层楼，走出江村，在江苏全省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小城镇研究，有千余人参加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和课题组的同志一起，探讨了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的规律与问题，概括总结了农民创造的“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才不兴”的经验，提出了“城——镇——乡一体化”的理论。通过小城镇研究，他找到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原因。解放后耕地日益减少，人口膨胀，农民从“大锅饭”里分到的越来越少。人多地少是发展乡镇企业的内在因素，而“文化大革命”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则是它的客观条件。乡镇企业发展了，小城镇也自然而然地伴随着发展。小城镇象个人口蓄水库，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把农村人口截留下来，极大地缓和了我国人口膨胀带来的就业矛盾。据统计，1978—1987年，我国乡镇企业已发展到1500万个，有8500万农民转入工业，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1987年年产值4500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3%，上交利税、出口创汇占全国的1/5。

面对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大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喜？是忧？理论界表示了极大的关

① 《费孝通的讲话》，《人民日报》1982年1月24日。

② 《费孝通的讲话》，《人民日报》1982年1月25日，第二版。

③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38页。

注，褒贬不一。1984年末和1985年初，我国一度出现基建投资、消费基金、银行贷款增长较快的现象，中央发现后，提出了加强经济领域宏观控制的措施，对乡镇企业的信贷投放收紧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乡镇企业的指责更多了。诸如，“乡镇企业同国营企业抢原料、抢燃料、抢能源、抢劳力、抢市场”，“以小挤大、以次充好、以落后冲击先进”，“乡镇企业是中国不正之风的根源”等等。有人怀疑苏南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搞第二次“大跃进”，有人要求不要再提劳动力转移和“无工不富”了。费孝通充分意识到问题尖锐，应当从农村变革的实践中寻求答案。1985年夏天，他冒着酷暑九访江村，在江村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向各个层次的干部和群众请教。不久，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九访江村》（收进《沿海六行》一书时，改为《故里行》）一文，回答了上述部分问题。苏南干部在争相阅读这篇文章，到处在议论，仿佛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落了下来。

费孝通在文章中首先以翔实的材料和中肯的分析，回答了现实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他指出，数月之内，信贷的大起大落带有盲目性，发展下去自然是会吃亏的，同时，他分析了吴江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原因。吴江经济的主体是工业，它占总产值的75%。在农村，工业以平均年增长30%以上的速度发展，的确容易令人生疑。乡镇企业的这种高速度是实实在在的事，它主要来源于农民的艰苦创业、集体积累，以及各级政府的积极扶助。1958年大跃进的景象，人们至今难忘，不会再去结出那种苦果。可喜的是，农村基层干部头脑清醒，不怕困难，他们以积极的态度贯彻执行宏观控制的政策，对基建项目和企业内部机制进行了微观调节，使乡镇企业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以更扎实的步伐向前迈进。文章接着分析了乡镇企业的成长历史和性质，指出乡镇企业有着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犹如“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①他称这种社队企业为草根工业。乡镇企业是在草根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向现代工业接近的工业。文章还就如何坚持“无工不富”、如何稳住农村，发展农业规模经济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的结论是：“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把农民一批批地吸走，农业劳力的紧张导致土地经营的相对集中，工业的利润则为农业的集约经营减轻负担和增强技术服务提供经济力量，而农业的规模经济又反过来以释放更多劳力的方式促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飞跃。这就是我对草根工业的意义和农业发展的前景和动力的认识。”^②

从30年代到80年代，费孝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江村进行了调查。不同时期的调查，抓住了不同的问题，把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不断推向深入。在此基础上，他组织江村50年课题组，于1985年开始，对江村半个世纪来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综合性调查。

江村50年研究的灵魂和方向

科学研究的任何课题，都必定有一个纲。这个纲是该研究课题的灵魂和方向。江村50年的研究，也是这样。费孝通在不同时期对江村的调查有相同的纲，现在回头考察江村半个世纪来的变化，也有同样的纲贯穿其间。

1986年，费孝通在访问西欧五国的时候，作了题为《江村五十年》的讲演，用粗线条描

^① 《沿海六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3页。

^② 《沿海六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31页。

述了江村50年间各个阶段的变化历程，每个阶段都以生产力的发展是迅速还是缓慢或倒退来衡量。一次，他和江村50年课题组的同志讨论江村50年研究，写一部什么样的书时说，我们这本书的纲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比较曲折，符合客观实际。又说，我现在所想到的这条纲，是由两个大的时期组成的，即两次革命，也可以说是三次革命，或者说第二次革命中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人民民主革命，第二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现代史里主要的两个时期，《江村五十年》这本书要反映这两次革命。书的特点是要把这两次革命联系起来看。当然，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受制于内部和外部的条件，同时，它又影响着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

旧中国，江村的生产力曾有过发展时期，主要是科学养蚕制丝，家庭手工业的发展。集中表现在“人多地少，农工相辅”这个基本点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毁厂败桑，以及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江村的经济一天不如一天，生产力衰败了。解放后，以土地还家、政治民主为中心的土地改革运动，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土地问题的解决解放了生产力，可是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却受到了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制约。合作化运动，土地由家庭单干变为合作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但由于忽视了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又误认为这种商品生产活动有碍于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予以限制和打击，以致农民除了生产粮食和国家收购的农产品外，只能从事一些极为有限的自给性的生产活动。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以求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结果欲速不达，操之过急，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经济虽然在调整和整顿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实际工作中，所增加的粮食，还跟不上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农民生活仍然相当困难，江村人均分配水平，长年徘徊在100元上下。

“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情况不完全相同，有相同的一面，有不同的一面，费孝通认为，不同的一面就是在城里工人停工停产打派仗，生产下降；而在农村，农民不能不吃饭，要吃饭就不能乱，就不能不种田。可是70年代开始，农村剩余劳力越来越多，剩余劳力要找出路，于是在夹缝中发展了社办工业。从此，农村生产有了变化，有了工业化的苗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经济体制作了改革的决定，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分别由家庭承包、独立经营，这一改革的成功，使得长久被大锅饭所隐蔽的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这便给已经走过初级阶段的乡镇企业以更大的推动力。在江村，在苏南等地区，农业、工业和副业协调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费孝通高度评价了这一发展趋势，他指出：“八十年代初期，农村经济的这第二次飞跃比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飞跃，其意义更为深刻。因为在这过程中，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与工业在产值上的比例翻了一个身。七十年代末还是农大于工，大致是七比三，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比例倒了过来，成了三比七，农小于工。”^①农村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以及由此推动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是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发生、发展的，它“动而不震”，费孝通在和课题组的同志分析时，喻之为“正在进行的一场悄悄的革命。”

纲举目张。费孝通紧紧抓住这个纲来纵观江村50年的变化，既可以从微观上描述江村的经济变化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和生动画面，又可以从宏观上探讨半个世纪来，整个中国社会

① 《江村五十年》，《群言》1986年第10期。

乃至世界经济波动制约江村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特点。

费孝通研究江村，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不停留在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考察上。“民以食为天”，生产是基础，如果研究农村社会的变化，不谈生产或仅仅是涉及生产状况，那将是肤浅之见。如果仅仅停留在生产发展的分析上，则失去了社会学的研究的学科特征。我们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等论著中，可以看到他总是用相当多的篇幅谈江村的生产和经济情况，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同时称他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但读者不难发现，他更深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是江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日常生活等的各种变化。在他主持写出的《江村五十年》一书中，把江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作了综合的反映。人们可以看到，科技下乡、工业下乡是怎样影响农民的，农民又是怎样接受科技、工业的，在接受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同年龄层的男女是怎样评论的，反映了什么样的心理和文化特质，等等。这种种连锁式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常常是双向的，并共同形成一股合力，给生产力的发展以反作用。人们还会看到江村人的婚姻与家庭、文化与生活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表现。

江村50年研究的意义

费孝通是一位幸运的学者。他前后50年研究同一个农村社区，在国内外学术史上还从未有过。这固然有赖于他的长寿和盛世社会给予的良好条件，但更有赖于他对社会学研究的决心和逆流而上的凌云壮志。江村50年的研究，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江村50年研究的意义，将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显示出来，现在我们仅作一初步的探讨。

江村50年的研究，是一种追踪调查。追踪调查是社会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采用的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把某一社区或群体作为长期观察、研究的对象，每次追踪调查都与以前调查所得的资料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较为系统深刻的认识。追踪调查比一次性的调查更具有科学价值。一次性的调查，即使是被认为是科学的调查，也只能提供该地一时的情况，对当时的社会提供一种横剖面的认识资料。这种调查往往是调查一完，任务就完了，丢了。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需要大量的省时省力的一次性调查，但也更需要选择一定的调查基地，有计划地进行长期的调查研究，以便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W·R·葛迪斯在访问江村后，于1963年发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专刊。葛氏在引言里高度评价了费孝通《江村经济》这一成功之作，同时又指出，欲使这一研究更有价值，就要进行追踪研究。葛氏写道：

“然而，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在社会人类学形成时期所作的许多研究，其资料犹如分散的岛屿一般，彼此是孤立的。这些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类认识社会的各种实例，人们可以把这些实例作为基础来研究社会的一般理论。但是，如果研究都是孤立的，那么，对社会过程的了解无论是从实际知识的角度或从科学的分析角度来说，其作用都是有限的。有关具体地区的一些资料很快会过时，它们只能提供关于变迁的可能性和原因方面的一些推测。因为每一个具体地区的资料只能描述某一个时期的情况。然而，如果后来，同一个

作者或其他作者，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继续以同样的精确性对同一社区进行描述，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从不同阶段的比较就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有效的成果。其价值也就会超过各个孤立的研究。”^①

葛氏在论述追踪调查的意义后说：“如果费孝通亲自重新调查这个农村，那是比较理想的。”^②

由于中国社会学在1952—1953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社会学教授都改行或半改行了，社会学的研究被迫中止。费孝通转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民族学研究，虽然与社会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已很难有回江村重作调查的机会了。葛氏作为一个外国人，尚且那么热情到江村进行追踪调查，作为江村研究的创始人岂可等闲视之？费孝通以此为据，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于1957年重访江村。可是这一重访招至了更大的批判，费孝通的追踪调查未能很好完成。80年代是安定团结的年代，费孝通对江村50年的追踪调查才如愿以偿。

费孝通的追踪调查与葛氏的追踪调查，虽然对象相同，但有很大区别。葛氏的追踪调查，是以他的研究实例为基础的调查，仍然是一种对异民族的调查方式。而费孝通的追踪调查则是对他原来调查过的地方，亲自再作调查，走的是本民族人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追踪调查。费孝通这种追踪调查比葛氏的追踪调查更难，意义更深远。这不仅是因为研究者本人的生命有限，往往身不由己，难以有机会重返“故里”，对过去调查过的社区重新调查、重新评价，而且还因为，只有研究者本人才更清楚当初这项研究的意图和研究中的局限，更能比较准确地评价该社区的发展趋势。例如，费孝通不是就村论村，而是要通过江村的研究认识中国社会，探讨中国农村应走一条怎样致富的道路；费孝通在现在进行的追踪调查中，发现30年代的研究有不足之处：如当时的土地外流、剥削制度的种种表现、村与城镇的关系、农民接受科学技术的思想变化等，在这次调查中得以补充和深化；江村研究应以什么纲来统帅，各个阶段有什么研究重点，以及怎样收集资料 and 如何描述江村半个世纪来的变化等，费孝通都有独特的见解和创新。毫无疑问，费孝通江村50年研究把追踪调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将会引起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更大注意。如果说：30年代江村的研究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可以说，80年代江村50年的研究将是这一领域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费孝通在解剖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说：“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说我过去的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能认识中国社会，首先是农村社会，弄清楚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有哪些基本特点，以便设计我们自己的道路。”^③然而，中国社会如此之大，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怎样才能接近这个认识呢？费孝通的方法之一是以小见大，以微见著。他首先把认识农村社会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然后选取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解剖，加以比较，达到对农村社会的一般认识，由此再演绎到对中国社会的一般认识。三四十年代，他和他的助手在云南选取了绿村、易村、玉村等农村社区进行调查，与江村相比较。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为他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理论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农村研究的理论概括，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点。80年代的研究

①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江村经济》附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68页。

②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江村经济》附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69页。

③ 《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第27页。

也是这样，他在江村进行追踪调查，又从江村出发，扩大研究领域，研究小城镇、研究边区开发。在比较分析中，使他了解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情况和问题。他的研究与实际紧密结合，不仅常常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具体意见，而且还立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常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整理成文提供给政府有关部门参考。这是他“认识中国社会，为中国社会尽一点力”^①的方法之一。

费孝通认识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方法，或者说，他获得成功的理想方法，是选取一个社会调查基地作为观察社会的窗口，不断地调查，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提高认识的科学性。江村就是这样的一个窗口。他从多次的追踪调查中，亲自看到江村在半个世纪里的巨大变化。半个世纪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和事件，江村基本都经历过。苏南等地农民创造的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江村人也在那样积极迈进。目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江村也都存在。因此，江村50年历程的描述，也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变化、发展中的基本情况和问题。将要问世的《江村经济》续篇——《江村五十年》一书，将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史的缩影。正如费孝通在《江村五十年》讲演中所说的：“江村的变化总的说来反映了全国农村所走过的道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先进模式。”^②在这个演讲的结束语里，他满怀激情地说：“江村在过去50年中的变化，很可能是更大更富有意义的变化的前奏。整个中国正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前进，江村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农村。它并不能代表其他的许多农村，但是，它们都是在同一的大势中推进，江村所取得的经验，无疑会影响其他的村子；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将从其他村子的实践里取得启发而获得解决。我们正在以无比的热情，追踪观察这一极其生动的过程，并力求如实地记录下来，为历史留下脚印。”^③

此外，费孝通在江村50年的研究过程中，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反映了他的治学精神。诸如，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以认识中国社会，为中国社会尽点力作为毕生社会学研究的主旨；理论联系实际，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认识上的失误；带着问题，深入基层，向各个层次的干部和群众请教学习，处理好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积极发现社会变化中的新苗头、热情地加以扶持，不断反映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努力为现实服务；建立社会调查基地，由点及面，点面结合，比较分析，概括总结；实地调查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等等。所有这些，费孝通用自己几十年心血换来的经验，都是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精神财富，值得认真总结和发扬。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王 颀

① 《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第4页。

② 《江村五十年》，《群言》1986年10月。

③ 同上。